

## 脸皮的厚度

醉放先生著

当人们长期处于无耻之中时，无耻的思维方式就会融入这个群体的文化之中。在无耻文化之下，人们的道德就会消退，面皮就越来越厚。无耻的文化就是厚面皮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下，人们相互攻击对方的道德问题、相互伤害、诈傻扮懵、奴性十足。

目录

[前言](#)

01 [逆向淘汰](#)

02 [以人论事](#)

03 [集体主义滋生无耻](#)

04 [厚面皮的文化](#)

05 [道德攻击](#)

06 [计谋](#)

07 [信誉](#)

08 [“义”与“不义”](#)

09 [正义成为孤独](#)

10 [偏见](#)

11 [歧视](#)

12 [比傻](#)

13 [无知](#)

14 [奴性](#)

15 [圣君情结](#)

16 [犬儒主义](#)

17 [权威的失落](#)

18 [互害](#)

前言

人类的文化就是作为相互关系的整体共同呈现出来的共同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标准。

当人们长期处于无耻之中时，无耻的思维方式就会融入这个群体的文化之中。在无耻文化之下，人们的道德就会消退，面皮就越来越厚。无耻的文化就是厚面皮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下，人们相互攻击对方的道德问题、相互伤害、诈傻扮懵、奴性十足。

本作品阐述浅白，只反映作者的观点，不试图成为学术性的著作。若想能更好地阅读本作品，可以先阅读《讲道理》、《无耻》、《成功与幸福》等作品。

## 01 逆向淘汰

无耻文化就是无耻群体的文化。那怎么样的群体才是无耻群体呢？那就要看在这个群体内是否存在人为地破坏公共说理的平台。

所谓的公共说理就是说服中立的具有独立思考 and 判断能力的第三者听众，而不是说服自己一方或对立一方的人员服从。信息对称指相关信息为所有参与各方共同分享的局面，如证券市场上对某股票信息进行充分公开披露，所有投资者处于相同的分享信息地位。信息不对称则指群体中的各人分享、拥有的信息量不相同。人为实施信息不对称是无耻群体的常态。

人为实施信息不对称不但是无耻群体的管理者用于获得利益的手段，也是管治的手段。群体管治者对舆论的控制对其统治的稳定非常重要。在信息不对称下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不对称信息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扭曲，社会的运行无效率，因而优胜劣汰，社会权威缺失。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于1963年首次提出不对称信息可能导致逆向选择。从经济学方面解释，就是指交易一方对交易另一方的了解不充分，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

社会在信息不对称下：

（1）社会的运行可能是无效率的。

（2）社会具有“逆向选择”的特征，即社会上只剩下次品。在经济上就是山寨盛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而在人事任命上就是逆向淘汰。

无耻群体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是各级管理者的层层任命制，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成员负责，这种十足官僚化的体制会排斥领导能力很强的、具有正直人格的管理人员，因为这些人会使他的同事们显得平庸无能且增加道德风险。于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敢担风险，决策果断的人往往会被排挤出管理层的权力中心，而顺利升迁的干部一般都是比较谨慎，不犯错误，人缘不错，为上司谋取个人私利的、有裙带关系的人。逐渐地，就会普遍地出现统治者从上到下的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这就是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淘汰。

例如，只有小学学历的牛仔是某一官僚机构的大气取样科的科长，早年买了个大专毕业证。一次要出去取样，实习生问牛科长：“要什么取样器。”牛科长说：“看国家标准。”实习生说：“国标要求是大流量取样器。”牛科长说：“那还不快去拿？”不久，一个实习生拿了几个20L/min的取样器，另一个则拿了500mL/min的取样器。牛仔看了看就大声责骂那个拿最大流量500mL/min的实习生，说：“500不是大过20吗，你大学是怎样读的？”实习生们面面相觑。

逆向淘汰是无耻群体是一具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所说明的就是“不以能力和品德评价人”的一个特征。在无耻群体里，一些有独立思想或独特见解的人，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精英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

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

由于逆向淘汰，被提拔的领导常常已失去管治的合理性，丧失了实质的内在权威。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繁荣虽然产生自投资和创新，但它也有赖于一种信念：即投资者和创新者必须确信，如果经营获得成功，他们的财富不会被有权有势的人夺走。因此，经济转型需要创新和技术的进步，也需要具有公信力的规则与标准化的引领。但在无耻社会中，没有人会为技术发明而投资，只会是山寨盛行。

在无耻群体中，人事的任命也常常是张冠李戴，故意地使得外行管理内行，以保持上级管理者的权威。同时，对于那些逆向淘汰而获得提拔的“技术精英”们，则常常不敢向别人谈及技术问题，担心自己的无知而遭到嘲笑。例如，一个通过人事关系而获得“教授”职称的所谓专家，在到一些技术单位检查时，常常只是提出一些琐碎错误，例如：卫生搞得不好、书写没有严格按格式等等。对一些实则的技术问题则常常带有商量的口吻，深怕自己不懂而闹出笑话。

## 02 以人论事

在社会各阶层中都可能出现个人角色的混同，在自我同一性的作用下，就容易出现双重意识的合理解释。双重意识是正常人在相同时刻存在两种(或更多)的思维方式，其中各种思维的运转和决策可以不受其他思维方式的干扰和影响。

当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行为与共同良知冲突而不愿修正自己的言行时，以自欺意识或双重意识进行自圆其说，实现自我同一性，就称为无耻。

在逆向淘汰下，那些被提拔的人多是无知与无德的。为了维护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地位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间无耻起身了。

为了解释自己所在的地位是应得的，他们就常常用双重意识来自我合理解释。他们的无知和逻辑混乱就更加使得双重意识大量运用，无知就成为一种力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里面说：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在无耻群体，不以个人能力和品行来评价人，这就是以人论事。与之相对的就是以事论事。以事论事就是以公正的态度讨论事情，不把各自的观点掺入进去。以事论事的人在一个说理平台之下，只能不仗势欺人，不歪曲事实，而是以理服人。以事论事的人心境前后一致，就事论事。而以人论事的人则生活在一个丧失说理平台的群体中，做事失去了原则，失去了公正和正义。为了自我同一性，以人论事的人常常伴随着双重意识。

明明自己是对的，可总得不到支持；明明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扎扎实实，却得不到认同；明明自己“理直气壮”，却没人吃你这套，明明人家是歪理斜说却得到别人的支持。那些叨而郎当没责任心的人如鱼得水，很吃得香。以人论事，就是谁跟我好，谁跟我亲近，谁拥护我，我就帮谁，就护着谁。以人论事的方式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以钱论事，以权论事，以势论事，以亲论事。

一个群体是不是一个文明而成熟的群体，常常是看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是否是习惯于以事论

<http://xian.name>

事，而一个人是不是成熟，其标志就是看他是不是以事论事。在无耻群体中，很多人都是以人论事。无论他多大年龄，多少的社会经历，只要是以人论事，他就不是一个不成熟的人。

获得信息越多、获得财富越的人显得是被认为是成功的。为了成功，有的人想方设法地获得金钱和地位，而有的人则努力地学习、探索知识。在无耻群体里，不以能力和品德评价人，知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受到打压。于是，想方设法地获得金钱和地位自然是所谓“成功”的主要途径。为此，比傻、奴性化常常是其成功的主要手段。

### 03 集体主义滋生无耻

在一个国家，除了政府，还有其他社会组织。在文明社会里，大多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都在公共说理下产生的，都拥有内在权威。在这些组织里，人们可以大胆发言，表达自己意见。这些社会组织不但能直至监督政府的作用，还使得人们的群体意识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此，政府就成为小政府。

而在无耻社会，大多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是上级任命的，往往只有外在权威。于是，人们的群体意识常常表现在非常关心政府政治，而对下层腐败无能为力，以致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常常利用“群体意识”来误导人们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在族群处于危难的时候，例如巨大的自然灾害、侵略战争等，人们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集体主义道德保证了族群的生存、进步。但是，如果当权者滥用集体主义道德来为自己谋私利时，集体主义就会成为无耻的滋生地。

例如，在一些极权国家，统治者常常成为特权阶级。为了能维持其统治，统治者就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名义来扭曲社会公共常识，对一些异见分子进行道德攻击。

在一些宗族里，当无耻盛行时，那些维护宗族及宗族成员利益的行为规范，却反过来为无耻的群体主导者提供保护。

### 04 厚面皮的文化

人类的文化就是作为相互关系的整体共同呈现出来的共同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标准。

当群体长期处于无耻之中时，无耻的思维方式就会融入这个群体的文化之中。在无耻文化之下，人们的道德就会消退，人们的面皮就越来越厚。无耻的文化就是厚面皮的文化，面皮的厚度所反映的是无耻的程度。

最小群体是家庭，是最小社会。在一个家庭中，父母是小孩的模范。所以，如果父母是无耻的，孩子受到了父母无耻的影响，他将来也就可能变成无耻。如果父母专制，那孩子也就容易接受甚至维护专制的社会制度。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家庭的传统文化不但影响孩子的文化方式，长此以往，甚至传给影响到基因的进化。

无耻的文化就是一种逆向淘汰的、比傻的、奴性化的、充满禁忌的文化，是原始的、落后的、无耻的、相互冷漠的文化，它使得人类文明在不知不觉中进入险境，就象是青蛙效应。

“青蛙效应”源自十九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学曾进行过一次著名的“青蛙试验”：他们将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大锅里，青蛙触电般地立即窜了出去。后来，人们又把它放在一个装满凉水的大锅里，任其自由游动。然后用小火慢慢加热，青蛙虽然可以感觉到外界温度的变化，却因惰性而没有立即往外跳，直到后来热度难忍而失去逃生能力时就被煮熟了。科学家经过分析认为，这只青蛙第一次之所以能“逃离险境”，是因为它受到了沸水的剧烈刺激，于是便使出全部的力量跳了出来；第二次由于没有明显感觉到刺激，因此，这只青蛙便失去了警惕，没有了危机意识，它觉得这一温度正适合，然而当它感觉到危机时，已经没有能力从水里逃出来了。

## 05 道德攻击

逆向淘汰的结果就是使得相当多的个人处于一个不正义的位置，地位不是应得的，并没有道德与自然的授权。而且，相当多的“成功”人事素质低下，为了显示自己“成功”的合理性，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道德的高地，对一些与自己相关的具有一定能力、人品的人进行攻击，这就是道德攻击。在无耻群体里，道德攻击是常见的事。

在一个不以能力、品行来评价人的无耻群体中，在逆向淘汰下，那些有能力与品行端正的人就会被打压。

例如，在一个机构的技术部门，如果你的上司技术能力比一般职员低，那他为了其当上司的所谓“合法性”，就会不知不觉地使得下属工作无所适从，使下属不能表现自己的才能。就这样，整个部门的整体素质就低下。更为甚者，还刻意寻找下属的工作错误和道德问题。人无完人，于是，一发现小问题就小事化大，利用作为上级的人事关系四处说自己下属的能力与态度是如此这般的低下。由于逆向淘汰的原因，当上司的工作能力与工作修养常常都比不上下属，于是，下属对于上司这样的无理言行和道德攻击也就不服了，职工们就常以“怠工”、“不紧不慢”等回应上级的工作安排，这就是所谓的“窝里斗而内耗精力”。

窝里斗是指在一个小的环境里有限的几个人之间的病态的竞争；也指自己人打自己人，起内讧。多数人认为，当一个人获得成功并超越了别人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不是想怎么奋起直追，而是首先想怎么把他拖下来，从而引起窝里斗。其实，这样的看法并不十分正确。在无耻群体中，窝里斗应该是逆向淘汰或道德攻击引发的结果。一个家庭，如果几个子女间出现矛盾多是非多时，大多是父母做得不公平引起的。同样地，一个部门，如果同事之间是非多多，那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机构的领导做事不合理所致。

在逆向淘汰下提升的领导，由于没有内在权威，那就只好从外在权威着手。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使得下属处于相互矛盾相互争斗之中。例如，在一个社区的计划免疫科，一个长期从事劳动卫生的人被提升到这个科做科长。由于不懂业务，就常常请教于一个快退休的老职工，这个老职工也认真地、无保留地说教。三个月后，这个科长以为自己已上手了，就不再那么尊重这个老职工了，有时甚至还故意挑他的毛病，在同事面前说他不工作认真，以老买老。但这个科长毕竟还是不懂业务，出了问题就指责科里的几个医生。于是，医生也就不服这个科长，做成对立。在这个科，医生都是职工，不能随便辞退，而护士则多是临工，一般不敢与科长产生矛盾。按规定，医生出打针纸，由护士打针，只要护士无打错针，出了过敏等事故就由医生来负责。科长为了对付这些医生，把医疗规定放在一边，出针纸、打针都由护士来做，把医生架空，还对单位领导说这些医生不肯负责任，工作不认真。虽然这些医生常常

<http://xian.name>

对护士说，护士是无资格开针纸的，但护士却宁愿听科长的。这就样，整个科室人事关系极度复杂，虽然在同一个科室工作，却形同陌路。当然，这个科长的做事方式实在太过份了，不久就调到办公室当主任，打针纸也就再由医生负责了。

又如，一医疗机构皮肤病门诊有 4 个医生，门诊主任老王已升了副高职称，但医术一般，而有个林医生虽然只是医师职称，但医术远近驰名，求医者众，老王很是妒忌。于是，有一次，药房要进药，每个医生都把自己要求的药品清单给老王，再由老王向单位领导申请进药，但老王则故意漏掉林医生的清单。就这样，林医生就不能有效地给皮肤病人开药，就只好写了一些药品名称让病人自己出外购买。一天，一个副区长来看病，林医生也就让区长去外边药店买药。区长问，为什么你们药房没有这种药？林医生回答，我不清楚，按规定我把所需购买的药品清单交给科长的。区长又问，那间药店有得卖？林医生回答说，我不可以讲那间药店有得卖啊，搞不好会被别人说我是与药店串通。过了几天，区长打电话骂了这个机构领导几句。

一般地，在无耻社会里，无耻者对攻击对象常常使用以下方法进行攻击：

- (1) 信息控制，定向控制言论和信息传播；
- (2) 道德攻击，攻击别人的道德问题；
- (3) 社交孤立，使得你无论是否正义，你被孤立就是你无道理，你无道德；
- (4) 经济手段，经济独立是自由的基础；
- (5) 暴力，包含热暴力与冷暴力。

一个人处于不正义的位置时，就常常主动地使用道德攻击等手段来摧毁说理平台。于是，因逆向淘汰被提拔的领导就垄断信息，不与下属有效勾通，保持所谓的领导者的神秘性，是其保留外在权威的一个重要方式。摧毁说理平台不但是道德攻击的目的，也是道德攻击的条件。只有在缺乏说理平台、信息不能自由流通的情况下，人们才使用道德攻击，因为道德攻击常常是“莫须有”的。在一个开放群体里，由于存在信息交流，存在说理平台，道德攻击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在开放群体里，人们的自由拥有充分的保证，在群体的行为规范没有有禁止的都是自由的，我们不能以道德的名义来限制人们的自由。如果你认为某人的道德不行，那你可以不与他做朋友，道德上的指责反而是不道德的。这些无耻攻击的目的大多是伴随着摧毁说理平台，使得那些“不合理的、不正义”的东西不能够曝光在公众的说理平台之下，以维护无耻攻击者的不合理利益。

## 06 计谋

博弈是二人或多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博弈就是寻找均衡的策略，所谓均衡，是指博弈达到的一种稳定状态，没有一方愿意单独改变战略。

假设有  $n$  个局中人参与博弈，如果某情况下无一参与者可以独自行动而增加收益（即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没有任何单独的一方愿意改变其策略的），则此策略组合被称为纳什均衡。纳什均衡，从实质上说，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状态。

在不完全信息博弈里，参与人并不完全清楚有关博弈的一些信息。大多数纸牌游戏是不完全信息博弈。在桥牌里，你并不知道你伙伴手中的牌，也并不知道坐在左右两位对手手里的牌。你在作决策时，必须对其他三位手中的牌做一个估计，而没有确切的信息。在给定自己的类型和对手类型的概率分布的情况下才可以找到均衡，而这种概率常常只是一种估算，而且还

处在动态变化中。这个时候，计谋就派上用场了。

计谋是信息不对称之下的一种能够指导行为的有效思维方式；是人们为了取得利益的方法论，主要包括：尽可能取得最大利益；尽可能减少操作风险。显然，几乎没有风险而取得了最大利益，就是最好的计谋。

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各博弈方同时决策，博弈方对博弈中的各种情况下的策略及其得益都完全了解。这时候就无需什么计谋可言，因为可以容易找到一种稳定状态的均衡。

在无耻群体中，存在信息上不对称是常见的事。互相不摸底或者不完全知晓其根底，采用计谋，以巧取胜，似乎是别无选择。选择谋略的最真实动机，绝不是为了与对方进行道德上的比拼，以一争高下，而是具体境况下的实际利益所诱致。以谋略取胜成了成本低而收益最高的事，这在军事生活和商场竞争中尤其如此。在文明群体里也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文明群体也重视谋略，但是，文明群体存在说理平台，要遵循既有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及与此相配套的伦理准则，而不是无所不在使用谋略。

例如“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提出的博弈论模型。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这种均衡就是纳什均衡。在经济学是，作为反复接近无限的数量，纳什均衡趋向于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如果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雷托改善。帕雷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雷托改善的状态；换句话说，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

信息不对称是计谋的原因，也是计谋的手段。在博弈双方施展计策时，都在尽力扩大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自己拥有对弈所需的信息优势。施展计策，拥有信息优势可能使自己在对弈中成为赢家，但就是会增加社会的总体成本。在军事战略上，什么信息战、什么出奇制胜等，都利用信息优势的策略。

例如，生产酒的厂家为了增加销量，决定：凡是他们牌子的酒的瓶盖都可以换取一定金额。于是，酒家饭店的服务员总是鼓励客人多点饮酒，甚至在客人不注意时倒掉一些酒，这样，服务员就可以换多一点钱。客人不知道这些情况下，总是不明白自己的酒水钱这么多。

例如官渡之战。公元199年（建安四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都。袁军兵力占优势。七月，进军阳武（今河南中牟北），准备南下进攻许昌。八月，袁军主力接近官渡，依沙堆立营，东西宽约数十里，曹操也立营与袁军对峙。九月，曹军一度出击，与袁军交战不利，退回营垒坚守。同年十月，袁绍又派车运粮，并令淳于琼率兵万人护送，屯积在袁军大营以北约20公里的故市（河南延津县内）、鸟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恰在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投奔曹操，建议曹操轻兵奇袭鸟巢，烧其辎重。曹操立即付诸实行，留曹洪、荀攸守营垒，亲自率领步骑五千，冒用袁军旗号，人衔枚马缚口，各带柴草一束，利用夜暗走小路偷袭鸟巢。到达后立即围攻放火。袁绍获知曹操袭击鸟巢后，一方面派轻骑

<http://xian.name>

救援，另一方面命令张郃、高览率重兵猛攻曹军大营。可曹营坚固，攻打不下。当曹军急攻鸟巢淳于琼营时，袁绍增援的部队已经迫近。曹操励士死战，大破袁军，杀淳于琼等，并将其粮草全数烧毁。张郃、高览闻得鸟巢被破，于是投降曹操，导致了军心动摇，内部分裂，大军崩溃。

计谋可以分为阴谋与阳谋。阴谋者，往往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在事件的深层次里面，让人不能轻易觉察，通过欺骗甚至是胁迫等方式来逼对手就范，施展阴谋者甚至不惜践踏道德底线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的，而阳谋是光明正大的计谋，所有的一切全都摆在桌面上，就像诸葛亮唱的空城计也是阳谋。这些阳谋都只有一个特点，可以算是心里较量的一种，就是考验双方的知识技术水平、心里素质以及对利益诱惑的抵制力。

例如，在买卖交易场上，买卖双方的信息并不是完全的对称，卖方隐蔽一些信息并不一定是无耻的行为，只要在合理的市场规范之下。计谋不一定是无耻的，只要在公共说理情形下所产生的行为规范之下就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人们在进行社会与经济活动时，为了个体的利益而违反共同良知时，常常是自以为是计谋了得而不承认自己的无耻。

## 07 信誉

有限次重复博弈是指相同结构的博弈有限次重复进行。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参与者会欺骗和违约。当参与者若明确合作到了最后一期，以后不会再有重复博弈，那么，最后一期的博弈和一次性的博弈就没有区别，参与者的欺骗和违约行为是不可能被报复的。于是，最后一期单个参与者的占优策略就是不合作的欺骗或违约。囚犯困境博弈的纳什均衡就是参与者的不合作。博弈被重复一个无限的次数称为无限次数博弈，当参与者不知道哪一次是末期时，决策近于无限次博弈。这种情况下，每个参与人不知道博弈会在什么时候停止，谁都考虑为自己留后路。此种博弈中妥协会比较多，信誉也比较好。

人的一生就象是无限次数博弈，在文明群体里，在公共说理之下有良好的信誉制度。于是，谁都考虑为自己留后路，谁都希望自己信誉比较好。在文明群体里，一个人在生活中要讲信誉，并不要你做一个道德楷模，而是为了自己生存之必须。

但在无耻群体中，没有良好的信誉规范，整个群体缺乏社会公共常识，做坏事的成本低，坑蒙拐骗所花的成本比诺重千金的成本要低廉得多，人人都在其间巧取豪夺，大家都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法，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而不注重信誉，市场经济就达不到所谓“看不见的手”期望的那种帕累托效率。实际生活中不讲信誉，而在道德上又大讲特讲，以至于这种道德要求最终变成了将自己不义的行为披上一层大义的外衣，日常生活也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充满阴谋的场所。

在缺乏信誉、缺乏道义的世道里，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丛林法则是人类的本性，是弱肉强食的规律法则，是人类自洞穴时代就学会的本领。丛林法则是自然界里生物学方面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法则。它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界中的资源有限，只有强者才能获得最多。大到国家间、政权间的竞争，小到企业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都要遵循丛林法则，至于竞争结果，那就看各自的实力、智慧、手段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了。在文明群体，丛林法则受到规范和舆论的制约。在无耻群体，行为规范不公平，舆论受限制，丛林法则就成为无耻者的行为法则。



在社交场合，人们担心“坏人”的报复而比较尊重“坏人”；由于相信平时比较关心自己的“好人”不会伤害他而不太顾及“好人”的感受。

在没有良好信誉环境的无耻群体里，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要阴谋，必要的承诺和非理性的威胁就会常常出现。当自己处于弱势时要使威胁可信，通常是：

- (1) 让对方相信你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人。
- (2) 切断沟通机制。

## 08 “义”与“不义”

在文明群体中，自由受到群体行为规范的保护，群体行为规范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但是，在无耻群体中，统治者为了自体的利益，使得行为规范不是用来规范自己的，而是用来规范普通群体成员的。于是，无耻群体的管理者常常以集体主义道德为名来限制群体成员的行为自由，而道德则常常源于无耻群体统治者的个人喜好。

由此，在无耻群体中，人们缺乏各尽其职的“责任心”，缺少完善公正的行为规范，人们在混乱的秩序中，不得已寻求一种地下的秩序来维持人际间的交往，那就是“义”，一种人际间的“对等”关系。由“义”维系的团体是这个无耻群体内的较为开明、较为文明的小群体。“义”是对等的，也是信誉的。没有信誉的人也就是不义的人。

在无耻群体里，共同良知常常扭曲，对自身无耻行为的自欺欺人的合理化解释后，面皮越来越厚，人们不讲诚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再，每个人都戴着面具与戒心交往，缺乏真诚与信任的基础。男人花言巧语只想哄女人上床，但不会履行他的承诺。女人表面对你热情转身却投向利益的怀抱。人们只顾短期的利益，而不顾及对等与回报。不义成为群体的常态，很多人不会考虑不义所增加的成本。然而，为了自身的利益，无耻的人从事无耻行为是有选择性的。在某机构，他可能贪污、横行霸道，但在另一个群体，他可能讲信用、义气。特别是在一些宗族、亲朋圈子里，“义”成为他们团结的纽带，“义”增加了他们在缺乏诚信的无耻群体中的竞争优势。无耻的人为了个人利益可以很无耻，但当遇到与自己利益无关时，可以是很有原则性，做到是有道德、有良知、有规范的人。或者，他们这样做也能使平常“无耻”的心得到一些慰藉。例如，一个在社会上无耻的人，他可能对儿子就讲信用，与自己山头的人可能比较有义气，还可能非常关照乡里，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双重思想就起作用了。于是，人们就会觉得他在某机构的贪污、霸道只是一种生存选择。

在无耻群体中，如果一个人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无耻是难以立足的，因为人生毕竟是一个无限次数博弈。于是，无耻的人都好面子，都自我感觉其行为是合理的，是自己能力所及而成功的。一个人如果拥有“无耻”名声的时候，不但是自己生活、工作受影响，就连自己家庭也受影响。为此，越无耻的人越是把自己放于“道德”的高度，首先对别人进行道德攻击。这就是所谓的先动优势。概率统计学中有一条著名定理：假设有两名枪法一样棒的枪手，同时向同一目标射击，尽管他们的射击精度一样，但是先扣动扳机的枪手命中目标的概率总是大于后开枪的。这就是先动优势。例如，一个宗族中有一个兄长，本身已有一定的地位，并拥有先动优势。他侵占了本属于弟弟的财产并对其道德攻击，当弟弟进行反击时，宗族中的长者反而会责骂这个弟弟，说兄弟要团结，兄弟团结才不让外人欺负。

<http://xian.name>

在无耻群体中，在缺乏原则的群体中，人们只能不讲也不敢讲原则，人们奉行丛林法则，于是，为了不向别人示弱，就会斤斤计较；而在文明群体，社会法律法规明确而独立，人们并不缺乏安全感，于是，人们就会讲原则而不斤斤计较。例如，有一个人，被强者大大地欺负了，就可能向别人哭诉，希望别人同情，为他出头。事情过后，就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与欺负过他的强者说说笑笑。如果这个人受到的是弱者的欺负，那怕是小小的欺负，他也表现得极大的不满。在无耻群体中，很多人会不知不觉中行为“不义”、没有信用。

那么，比较容易“不义”的人是怎样的？那些是非不分，无原则的人更容易拥有无耻的思维方式，常常是不“义”的人，这些人常常大事不讲原则，小事斤斤计较。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与无诚信的、不义的人来往频繁的人，就会较容易地被别人认为也是诚信有问题的人。

### 09 正义成为孤独

“义”是指对等的、公平的。“正”是指应得、自然与道德的授权，即在群体中处于什么地位就负什么责，做什么事；与儒家所说的“中庸”的意思差不多，做自己所做，做得太多或做得太少都是不中庸的。“义”与“正”合起来就是正义。正义有三个基本观点，平等、应得、道德与自然的授权。

“正”是对职位要尽职，“义”是对亲朋要有人情味。在无耻群体中，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不正”、“不义”的行为。在一个逆向淘汰下的无耻群体，人们对“不义”的容忍度比“不正”小得多，因而人们都关心“义”的名声。

在一个无耻群体里，当一个权贵者做了一件“坏事”，无故伤害了别人，特别是无故伤害弱势人士，稍为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是不正义的行为，但很多人都不敢或不愿公开反对他，都希望与这个权贵者保持良好的关系，更为甚者，有的甚至不肯公开与受到伤害的人交往。人是社会动物，在无耻社会里，如果不合群，不学着“无耻”，就会受到攻击，就会更孤立，利益更不受保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观”：大多数人内心认可的人或事成为孤独，人们常常做一些与内心相违背的事。于是，慢慢地，有的人就分不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社会常识被扭曲，是非黑白全颠倒。就这样，在一个无耻群体，正义成为孤独，弱者成为孤独。试想一下，当一个正常人生活在一群精神病者中间会怎样。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 Rosenhan 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罗森汉恩招募了8个人来做假病人。8个假病人由1名研究生、3名心理学家、1名儿科医生、1名精神病学家、1名画家、1名家庭主妇组成。他们要完成的任务是把自己送进12所精神病院。到了医院后，所有假病人都说相同的指导语，他们说自己能听到“轰”和“砰”等声音，除了这个症状外，所有被试的言语和行为完全正常，并且提供给医院的信息都是真实的。结果，除一人外，其余被试均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一旦进入医院，所有被试不再表现任何症状，行为完全正常。被试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被释放，直到医务人员认为他们已经恢复正常才能出院。结果，在研究中出现了关键的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假病人被任何一个医务人员识破！当这些人出院后，他们的心理状况被认为是“精神病恢复期”而记录在他们的病历中。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发现：当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没能鉴别出假病人时，其他的真病人却不那么容易被欺骗。在3个假病人所在的医院，118个真病人中的35个对被试表示怀疑，他们怀疑被试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你不是疯子！你是记者或编辑，你们是来

## 10 偏见

与共同良知相对应的是公德，而与自发良知、具有个体差异的良知相对应的则是私德。只要没有违背法律、违背共同良知、违背公德，我们就不应该以道德的名义来指责别人。如果你厌恶别人的言行、动静，可选择远离他。你可以看不惯别人的行为，但不应动不动就说别人没有道德。以私德来指责别人就会构成偏见。例如：对于一个行为“不道德”的人，你可选择不与他建立“好朋友”的关系。但是，只要他不违反法律，就不应随便以“道德”的名义指责和对待他。由于家庭的影响，人们觉得“不道德”的人的子女行为“不道德”的可能性比别人大，这也可能构成偏见。

偏见是指根据一定表象或虚假的信息而做出判断，从而出现判断失误或判断本身与判断对象的真实情况不相符合现象。在缺乏讲道理的无耻群体中，人们得到的常常是虚假的信息，因而常出现偏见。

常识是捷径，对捷径的乱用就可能引发偏见。错误的判断，盲目的推理，无知的肯定和否定，都是造成偏见的因素。偏见的圈子既狭小又自私，是人们认识世界万事万物所萌动的臆断情由，它携带着主观意识情感看问题，以人论事。

偏见可以助长偏见，从而产生更加不良的后果。被偏见影响较深的人往往失去自尊心，以致他们实际在生活上变成像别人所期望的一样。压迫之下的受害者可能变成充满愤恨，对偏见更加敏感，以致有时在其实没有偏见存在的地方也看出偏见。

社会地位决定对社会个体之间的差异起着很大的作用，而这种差异常常是社会不公所导致的，而不应该以此作为偏见的依据。至今为止，科学上并没有找到种族在社会差异方面的生物学依据。

在 Sherif 经典的罗伯斯山洞实验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中，21 位 11 岁的小男孩被带到了奥克拉荷马州的 Robbers Cave 州立公园去参加一个夏令营。他们不知道其实自己是一个实验的被试。在这个旅行之前孩子们被随机分为两组。Sherif 研究两组人之间如何产生偏见和冲突的基础。当孩子们到达的时候，他们住进了单独的小屋里。而且在第一个星期中，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组人的存在。在游泳和徒步旅行中他们相互熟悉。两个组都给自己选了名字，并将名字印在自己的衬衫和旗子上：一组叫做老鹰队，另一组叫做响尾蛇队。现在两个组已经建立起来了，实验进入了第二阶段。两组人第一次发现了对方，并且不久后组与组之间的冲突迹象以语言上的侮辱这种形式出现了。可是相互咒骂还不够。实验者希望大大加剧冲突的程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让两组人在一系列的竞赛中相互竞争。这渐渐加重了两组人之间的敌意，特别是两个组的所有得分被加在一起，而响尾蛇队最后得到了总分第一的奖杯。他们没有让老鹰队忘记这次失败。响尾蛇队在球场上插上自己的旗子，将其据为己有。随后两组人开始相互咒骂，还唱着侮辱对方的歌曲。不久后，两组人就拒绝在同一个房间里吃饭了。两组人之间的冲突被成功激化之后，实验现在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两组人和好。首先，他们尝试组织了一些两个组一起参与的活动，例如看一场电影和放鞭炮，不过没有一样管用。实验者然后尝试了一个新的办法。他们把孩子们带

<http://xian.name>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并给了他们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中，孩子们被告知一些破坏者蓄意袭击了他们的供水系统。在两组人成功合力扫除一个龙头旁的障碍后，第一粒和平的种子被播下了。在第二个问题中，两组人需要一起凑钱去看一场电影。他们选定了一部大家都愿意看的电影。在那天晚上，两个组的成员又一次聚在一起吃饭了。接下来的几天里，孩子们又“意外地”遭遇了更多的问题。关键的一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了更高一级的目标：两个组里的孩子们一起合作完成牵涉到他们共同利益的事情。最终，所有的孩子决定坐同一辆大巴回家。他们终于和解了。

## 11 歧视

把偏见赋之行动就成为歧视。所谓歧视，就是只根据其身份、地位而非品格优劣，给予不同的对待。歧视就是不平等待遇，其目的实际上是歧视方在寻找说不上出口的理由，使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不正义的利益维持下去。在无耻群体，歧视非常普遍。偏见不是罪，但把它赋之行动的歧视常常是罪恶之源。

例如，在一些无耻机构，出现“逆向淘汰”现象，即排斥工作能力很强的、具有正直人格的职工干部，而获得提拔的平庸无能之辈，既无知又摆架子，而且本领越小越摆架子，官越小越摆架子。更为甚者，这些获得提拔的平庸无能之辈会不知不觉地对工作能力强的、具有正直人格的职员产生偏见甚至歧视的心态和行为。有意无意之间指责他们工作不认真、不积极；时刻关注他们有没有错误，对他们进行道德攻击。以这些人的能力虽然只能发现一些鸡毛大蒜皮的小问题，但常常小事化大，严肃地指责。更为甚者，还把自己的错误理解强加在别人身上，逼使别人从事低级错误的工作。这些人，对上奴性十足，对下则显得高高在上，歧视弱小。在这些人看来，似乎地位低下，道德也一定低下。他们歧视一切地位低的人，特别是歧视由于“逆向淘汰”而被排斥的工作能力强、具有正直人格的同事。他们会扭曲常识，自我感觉自身所得的地位是来源于“血统”上的优势，是与生俱来的。对于他们来说，歧视已是常态，也是维护他们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利益的手段之一。

## 12 比傻

有人说过，在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度，个人的成功只有 30%是靠自身的奋斗。而在一些无耻国度，就可能只有 1%是靠自身的奋斗，很多人的成功，不但要无耻，还要靠运气。在逆向淘汰下，比傻是成功之道。

如果不幸生在一个无耻的国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的奋斗不会得到应得的回报，你现在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你的未来地位。如果你父母是穷人，你就很大可能也是穷人，就算你曾奋斗过。在这样的一个国度，人们认为成功是靠拼爹和运气，于是，很多地位低的人也就放弃了奋斗。而那些父母是权贵的人，他们不需要多少的奋斗也可获得成功。就这样，只有极少的人、那些有机会接近权贵的人才可能认为奋斗是有收获的。

在一些无耻机构，那些新毕业的大学生进来几个月就明白：获得提升与其工作能力、专业水平、工作的积极性几乎没有多大的相关性。对于没有人事关系，家庭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来说，他们根本不会在专业能力方面下功夫，只是凑合着工作。与领导搞好关系、工作上听领导的话是他们最优的选择，而不管对与错。撞上好运也许获得提升，而这些，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提升与专业能力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事实上，甚至正是因为专业能力不太行才

使其获得提拔。

“枪打出头鸟”这样的训诫，孺妇皆知，成为无耻群体里集体无意识的认可准则，是逆向淘汰下的行为准则。这种环境在无耻群体里，是否“聪明”是由其所在的地位决定的，各级管理人员随着等级的不同，下级始终比上级更“愚蠢”一些，直到最“愚蠢”的底层亦即广大的下层人员。我们不防以一个寓言作例子：在一个小森林里，有狮子、刺猬和白兔。一天，白兔请教刺猬：“刺猬大哥，1+1 等于多少？”刺猬回答道：“等于 2。”刺猬还如此这般地详细解释。这个时候，作为这片森林的大王——狮子则果断地说道：“1+1=2 是错的，应该等于 3。”到这个份上，可悲的是故事还未完。一向担心狮子会吃掉她的白兔见状，附和地说道：“是啊，有时候，1+1 是等于 3 的。”刺猬一面子尴尬。

在无耻群体下，人们比的是谁比谁更更愚蠢，形成的文化是一个“比傻文化”。在这种文化下，知识不受尊重，人们不是堂而皇之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假装不聪明，至少表面上要如何愚蠢，以便比自己“更聪明”的上司欣赏你，得到他的提拔。于是，吹牛拍马、装疯卖傻便成了人们为了生存所必须的日常行为。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就要装疯卖傻到别人无法窥知的境界，实在也是天下难事。

在比傻文化下，权威是强制的外在权威，没有知识与能力的内在权威。人们尊重权贵而不尊重知识。这样的结果，便是民众中有稍微的反抗或者不听话的聪明，都可能被打压。

### 13 无知

在无耻群体，人们的信息交流与行为受到不合理的限制，道德价值观也有可能受到扭曲。于是，很多人就可能是无所适从，逻辑混乱，出现认知失调、认知能力低下。

曾有人做过实验，将一只最凶猛的鲨鱼和一群热带鱼放在同一个池子，然后用强化玻璃隔开。最初，鲨鱼每天不断冲撞那块看不到的玻璃，耐何这只是徒劳，它始终不能过到对面去。而实验人员每天都有放一些鲫鱼在池子里，所以鲨鱼也没缺少猎物，只是它仍想到对面去，想尝试那美丽的滋味。它每天仍是不断的冲撞那块玻璃，试了每个角落。每次都是用尽全力，但每次也总是弄的伤痕累累，有好几次都浑身破裂出血。（实验中，每当玻璃一出现裂痕，实验人员马上加上一块更厚的玻璃。）

持续了好一些日子，鲨鱼就不再冲撞那块玻璃了，对那些斑斓的热带鱼也不再在意，好像他们只是墙上会动的壁画。它开始等着每天固定会出现的鲫鱼，然后用他敏捷的本能进行狩猎，好像回到海中不可一世的凶狠霸气，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假像罢了。实验到了最后的阶段，实验人员将玻璃取走，但鲨鱼却没有反应，每天仍是在固定的区域游着。它不但对那些热带鱼视若无睹，甚至于当那些鲫鱼逃到那边去，他就立刻放弃追逐，说什么也不愿再过去。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进化心理学家 Satoshi Kanazawa 说，“比较聪明的人比不太聪明的人更有可能认识和理解新的实体和情境。”在一些研究中，Kanazawa 认为人类在进化上是被设计成保守的，主要关心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而作为自由派，关心无数素不相识的、在基因上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在进化意义上是新的。因此比较聪明的孩子更有可能成长为自由派。来自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的数据支持了 Kanazawa 的假设：主观上认定自己“非常自由派”的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的平均智商是 106，而认为自己“非常保守”的年轻人在青少年

<http://xian.name>

时期的平均智商是 95。“因此，比较聪明的孩子长大之后更可能违背信仰上帝的自然进化倾向，于是他们成为无神论者。”认为自己“完全不信仰宗教”的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的平均智商是 103，认为自己“非常虔诚地信仰宗教”的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的平均智商是 97。

#### 14 奴性

无耻群体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金，即可主宰其意志。经济上不独立，思想听命于雇主。在这样的社会之下，由于从众心理作怪，使得人们不知不觉地显示出奴性。

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神经生物学家巴里·里士满（Barry Richmond）领导的科研小组在恒河猴身上找到了一种叫做“D2”的基因，控制动物性情、让其心甘情愿成为奴隶，而人类身上亦具有同样的基因。

在无耻群体里，上级领导会想尽方法使得下级觉得：他们的自身利益无时无刻不维系在上级领导的个人喜好上。于是，人们就出现了习得性无助，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习得性无助是指如果某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遭受太多失败或挫折，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于是，就会放弃改变自身状况的努力。当人们出现习得性无助时，内心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而双重意识的运转能部份地使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减少。

科学家曾用一个对狗做过实验，实验中将两条狗分别放在两个吊床中，吊床前放置杠杆。对两条狗进行持续多次的电击。第一条狗触动杠杆后，电击会停止；第二条狗触动杠杆则不会停止电击。当吊床实验做完之后，再将这两条狗放到一个有障碍物的屋子，第一条狗在屋中遭受电击时，会跳过障碍物逃走；而第二条狗在遭受电击时，则只会躺在原地不动，甘愿被电击也不尝试逃走。这就是习得性无助——尽管第二条狗看到第一条逃走的范例，也知道自己能逃走，但它并没有进行尝试。

1973 年 8 月 23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对着里面一阵狂扫乱射，一边打一边说 Party 开始了，最后几个女店员被抓进地下室。六天后，这几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她们认为营救她们的警察要害她们，而绑架她们的人是在保护她们。为什么？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她们的人，除了对她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而且还让她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她们。在这种情况下绑架者没有打死她们，没开枪，她们已经感激不尽了。不但如此，还给她们食物，给饭吃，还跟她们进行有趣的思想交流。这是一种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欲望，使她们认同了绑架她们的人，甚至她们喜欢的，她们就喜欢，他们讨厌的她们就讨厌。这个认同的过程很微妙，前提是她们不想速死，并且人家掌握着随时要她们死掉的权利。就这样，她们从战战兢兢开始，逐渐地归顺，并且在几天里形成惯性，认可了这种生存方式。更离奇的是，当她们被营救出来时，你听不到她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她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还有一个干脆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还建立了一个为绑架她的人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需有四个条件。1 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在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就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毫不犹豫；2 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3 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4 让你感到无路可逃。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

<http://xian.name>

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

## 15 圣君情结

圣君情结或清官情结，就是指在无耻群体里，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高管理者身上，希望这位最高管理者足够贤明，给群体成员带来幸福生活。导致清官情结的原因是臣民意识与习得性无助。

所谓臣民意识，就是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被统治者、仆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与之相反的是公民意识——认为自己是国家或社会的主人，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在无耻社会里，很多人自觉地表现奴性，一种内化为自身主动性、自觉性的意识与行为，表现为对被给予的，对自身有消极意义的事物的无原则的接受性，是卑鄙的或下贱的奴隶根性或驯从。对于具有“臣民意识”的人，当国家、社会、宗族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是统治者的事情，跟自己无关。所以只是采取旁观者的姿态。对于患有“习得性无助”的人，当国家、社会、宗族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认为：对于这些问题，自己完全无法施加影响，完全帮不上什么忙。

如果社会问题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那也就算了。有很多社会问题其实是会殃及底层民众的。一旦发生这些社会问题跟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就会导致臣民意识或习得性无助的人的内心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双重意识在运转。因为他们一方面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自己又无法去解决。这种内心的矛盾会进一步转化为焦虑。当内心产生焦虑时，心理防御机制就会起作用。心理防御机制有一种机制叫做幻想。于是，这两种人就幻想出现一个“圣君”。有了“圣君”，就可以帮他们解决种种社会问题。如此一来，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也就得以消除。

圣君情结或清官情结使得民众的注意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人物身上，而忽略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这就很容易被统治者利用，从而神化统治者，推行有利于统治者的价值观。

例如，在一些官僚单位，那些渴望升职的人常常揣测上司的心思，总觉得上司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深层次的含意。又如，一些“爱国者”觉得自己国家很强大。政府外交强硬时说政府这样做非常好，维护了国家的尊严；政府外交不强硬时就说政府有后着，是谋略，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反正，政府是伟大的，做什么都是非常正确的。

1960年代，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1933-1984)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米尔格拉姆为此制作了一个极其逼真的电击装置，那是一个看起来很闪亮的大金属箱子，在箱子最上方最前面有一排按钮。实验的基本方法是：实验者招聘了4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市民，告诉他们参加一项名为“惩罚对学生学习影响”的研究。他们充当“教师”，在实验者的指令下，当“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时，对“学生”施加强度和痛苦程度不断增加的电击。尽管学生以各种形式反抗，有26名受试者在实验者的命令下，坚持到最后，对“学生”施加了最强程度的电击。米尔格拉姆改变实验的要素，做了19个独立实验，实验对象多达1000人。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深度分析，揭示了在等级社会中服从权威现象的社会及心理原因。这一实验的设计与结果震惊了全球心理学界，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心理学家在不同时期重复了这一实验，得到的结果基本相同。

## 16 犬儒主义

在无耻社会中常常出现犬儒主义。犬即是奴性，儒就是知识分子。犬儒主义指的是知识分子的奴性思想。

在无耻社会、无耻群体里，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人们的信仰，犬儒式机会主义者盛行，正式场合都是逢场作戏，人们产生看破红尘的态度，享乐的心态。少数勇敢的正义人士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起初，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权贵对正义人士泼污水，很多人竟然也认同权贵的行为。

犬儒主义的出现原因有两个：

(1) 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因而，犬儒主义者感到不得不攻击前者，使得前者看上去不那么高尚，这样才能使自己显得不那么堕落。

(2) 犬儒主义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演戏。于是，犬儒主义者认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真正追求真理。那些异议人士，很可能就是一些撒谎的骗子。

这样，犬儒主义者就可以减轻内心不安，以恢复心理平衡与稳定，减少压力。这种犬儒主义给独裁者、作恶权贵帮了大忙。由于人们普遍互不信任，利用这一点，就能把不听话的正义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的欺骗性宣传，所以也就不必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无耻社会、无耻群体的稳定，可以代替大规模恐怖的维稳。”

## 17 权威的失落

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无耻群体里，如果你的上司技术能力比一般职员低，那他为了其当上司的所谓“合法性”，其行为就常常不会光明正大，只会耍阴谋。他会不知不觉地使得下属工作无所适从，使下属不能表现自己的才能，就这样，整个部门的整体素质就低下了。

例如，武大郎开烧饼店，招工的条件之一是身高不能超过老板武大郎，因为做老板的不能抬起头才能对自己的职员讲话。不久，武大郎要提拔经理，被提拔的经理几乎是最矮小，这样武大郎就可以居高临下对经理训话了。这个寓言表达了某些社会的“精英”、管理者素质非常低，远远比不上一般的平头百姓。无耻群体就象武大郎烧饼店一样，使得社会人员的素质成倒金字塔形，越向上素质越低。

群体当权者失去内在权威，就是权威的失落。由一个美国人创立人的浑水调查公司（Muddy Waters Research）就是利用某些公司的道德风险进行狙击、做空的。从2009年开始在北美资本市场当中，浑水研究公司先后发出真实的研究报告揭露了四家在北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东方纸业（ONP）、绿诺科技（RINO）、多元环球水务（DGW）和中国高速传媒（CCME），这四家在中国经营的民企因这浑水公司的揭露导致股价大跌，分别被交易所停牌或摘牌。

社会上不断出现食品安全、环境安全问题，其主因多是来源于行政不作为。例如，在一个监



<http://xian.name>

督监测的行政机构，虽然已通过什么 ISO 质量认证，什么资质认定、实验室认可等，但无论是这个机构的技术管理人员，还是认证认可的评审专家，都是“逆向淘汰”产生出来的。甚至有的只有小学水平的人也可以通过买学历进入技术管理阶层。无论是他们的质量管理活动，还是评审活动，就象是一场“肥皂剧”。对他们来说，无知就是力量。而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技术过硬的、正直人格的人则被排挤，他们有的远远望着“权威们”的闹剧，而有的甚至被逼参与其中，被逼从事低级错误的技术工作。由这些机构负责监督监测的食品安全、工作场所安全、环境安全的情况可想而知，在人们心目中，他们的诚信经已所剩无几。这就是权威的失落，这些管理“精英”们的内在权威已丧失殆尽。权威失落时，伴随着特权和腐败，群体失去公信力，公众的不满情绪蔓延。在企业，则使企业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

## 18 互害

在现代社会，有相当多的国家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不管是什么宗教，都会有禁忌和神话。宗教的这些禁忌，是不允许人们自由地讨论的，这是维护宗教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这些禁忌不应与共同良知相冲突，可以自由信仰的宗教是不应扭曲共同良知的；而邪教则会扭曲共同良知，把部份共同良知作为宗教禁忌，禁止自由讨论。

那些扭曲社会公共常识的带有暴力的邪教常常把某些共同良知作为禁忌，并定向封闭其信息。在无耻群体中，利益既得者把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但与共同良知相冲突的理念作为禁忌，并随之提高到道德的高度，不惜扭曲社会公共常识。所以，在定向封闭信息的无耻社会里，邪教出现的机会就比信息自由流通的社会大得多。

无耻群体会容易产生混乱的环境，混乱的环境被认为会鼓励犯罪和反社会行为，鼓励无耻行为。一项新研究表明混乱的环境还会导致人们对他人形成成见。久而久之，全社会就会充满着“冷漠”。

荷兰蒂尔堡大学社会学家 Diederik Stapel 和 Siegwart Lindenberg，让受试者在混乱或有序的环境中某个社会团体进行判断。结果显示，环境越混乱对该团体的偏见越大。其中一项试验，研究人员在街头对 47 名路人进行调查。第一天，人行道上的地砖被移走，一辆汽车停在街沿，而一辆自行车则被留在街道上。第二天，街道已被打扫并看上去整洁有序。研究人员发现，与街道清洁的时候相比，当路人站在脏乱的街道上时，他们更容易歧视他人，而且给“少数族裔基金”捐款会少一些。研究人员的结论是：对结构和条理的个人需求与成见现象有很高的关联度。

在一个没有说理平台的无耻群体里，群体就会渐渐地失去道德的准则，人们因地位的“重要”而做错事也得不到约束。群体变成互害的群体，即所有人是所有人的敌人，不管你是位高权重，还是卑不足道；人们彼此冷漠、相互提防、互为敌视。在这样的群体，没有人能拥有安全感。

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抛，丝毫不觉羞愧。这些是可以在人群中传染的，即所谓的“破窗效应”，这样的群体就是互害的群体。

作品于 2015 年 3 月完稿。

作者简介：醉放先生(<http://xian.name>)，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因时有醉而放言，故号醉放先生。